
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的一部力作

——评《倭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一书

朱懋铎

德国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是中国抗战外交史领域内的一个主要课题，也是中德关系史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部中德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课题的研究对研究民国史、抗日战争史、国民党史、现代远东国际关系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外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与专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早，有多篇论文问世，但大多侧重于对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的前因后果的研究，未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德关系的角度做整体的研究。大陆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才有人开始涉足这一课题，从不同角度零星发表过一些文章。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马振犊、戚如高两位青年史学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终于将《倭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这本30余万字的专著推出面世，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于1997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人读后兴奋之余，不揣学识浅陋，愿对该书作一评价。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德国魏玛政府为摆脱孤立的地位，急欲开拓海外市场，寻求伙伴，于是把眼光瞄向远东的中国。虽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此时仍处在列强的欺侮之中，亦需寻找平等伙伴。两家一拍即合，遂有了1921年签订的《中德协约》，此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

列强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此后,中国出现北洋政府与广东革命政府的对峙,德国魏玛政府对中国政局持谨慎态度,故两国关系裹足不前。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两国关系迅速升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日益增强,两国关系处在“蜜月年代”。到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中德外交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有了十分显著的进展,中德两国从此建立了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的全方位的合作。但此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特别是1936年德日结盟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不能不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日成为敌国,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中,中、德是友?是敌?最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法西斯德国改变了对华政策,两国终于从朋友转化为敌人。这部著作全面阐述了在抗战期间中德两国是如何从平等的合作伙伴最后分道扬镳的历史过程。

这部著作读后觉得有三点值得称道:

一是全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

此书并不是从抗日战争爆发时写起,而是用两章的篇幅叙述了抗战爆发前的中德关系,从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广东革命政府的联德活动,蒋介石的联德方针入手,为国民政府后来倚重德国的前因做了很好的交待。同时,也用了一些笔墨介绍了德国的远东政策,这样为两国平等合作关系形成的缘由做了极好的铺垫。进而全书进入正题。从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1年中德两国断交、宣战,两国的关系既丰富又复杂。作者重点突出了三个问题,即:德国军事顾问团在华活动;两国经贸关系,特别是军火贸易;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停。这三个问题可谓是此时中德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作者在叙述这三个重点题目时,以时间为序,分不同内容予以评述,使人读后对两国关系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了解,对中德关系的最终破裂的原因是德国法西斯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的结论令人信服。作者最后又用了不多的文字交待了德国投降后中德复交的努力,从而

为这段历史划上了一个句号。这样,首尾相接,前因后果论述有据,使此书全面、完整。

二是资料翔实。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第一手材料,把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展现出来。诚如作者在后记所云:“以近水楼台”之利,为自己做了这“一袭单衣”。但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二位作者并未以“近水楼台”之利,垄断材料,而是在此之前经过多年的整理,把馆藏档案中有关中德关系的内容编辑了一本《伊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年)》,在1994年公开出版,供国内外学者参考。正如作者在编辑说明中所称:“此书出版的目的是为适应国内外学者及广大读者了解、研究民国时期南京政府与德国特别是纳粹德国关系的需要。”这与当前学术界个别人为己之利,封锁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档案材料,先将研究的成果发表之后,再将史料抛出的做法相比,这二位作者为繁荣学术共同发展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三是文字精炼,记述生动,可读性强。

该书文字经过认真的推敲,没有冗长的句子和空泛的议论,一脱某些史学著作中干瘪枯燥,味同嚼蜡的旧巢。书后所附人名索引、中德两国使节表、大事记等为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外,书中还附有一些珍贵的、鲜为人知的照片及原档图片,使全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金无足赤”。作为一部开创之作,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可能是由于两位作者分头执笔,在个别情节上前后有重复之处。在史料方面,对国外一手材料,特别是日本、德国档案材料引用不多,略显单薄。据悉,目前德国史学工作者正在编纂8卷本的大部头的《中德关系史料选辑》,如果能够汲取一些国外的官方档案进行修订,则此部专著会更臻完善。

抗战期间中德两国除有官方外交关系外,还有两国人民交往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一些德国友好人士在中国抗战期间,坚决地站

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如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先生在日本南京大屠杀期间,不仅挺身而出,联络其他国际友人设立了国际安全区,救助了25万中国难民,而且以日记形式记录了日寇的暴行,为后人研究南京大屠杀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拉贝先生回国后受到纳粹的迫害,在其晚年贫病交加的困难时刻,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在1948年成立“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募集资金与食物寄赠给拉贝先生。又如德共党员汉斯·希伯,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记者身份深入抗战前线,向世界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国人民,特别是新四军、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文章。1941年11月30日,他与八路军将士一起在与日寇的浴血战斗中牺牲,至今他的忠骨仍埋在山东沂蒙山下。如果这部著作在修订时能撷取一些中德人民友好交往的动人事迹,则此书会更完善、更生动。

“瑕不掩玉”。尽管此书有些不足之处,但这部著作确是在中国抗战外交史研究上的一部力作。

(作者朱懋铎,1939年生,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